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1926 年至 1949 年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1)
“万木草堂”回忆	梁启勋(53)
简述“哈佛燕京学社”	聂崇岐(60)
桐油买办商义瑞行的经营始末	李景文(70)
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	徐国懋(115)
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陈修和(128)
云南空军始末	张汝汉(142)
我与广东空军	丁纪徐(166)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谭 光(183)

附注

对《1926 年至 1949 年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万木草堂”回忆》一文的质疑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对《云南空军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

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关于旧大公报的历史,我们曾经将自从英敛之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这个报,到王郅隆及其后人手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的一段,统称为“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作为前段整理过了。现在继续谈的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经营时期的旧大公报。这是后段。这一段历史,是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续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于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共约二十三年的历史。

1926—1949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经营的新记公司大公报,是从安福系财阀王郅隆的后人手中购买过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原址(日本租界四面钟对过,现和平路二四一号)续刊,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这个报归人民所有,旧大公报的历史从此结束。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年代,它包括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四个重要时期。这不太长的二十三年,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鸦片战争起，斗争了一百多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这一时期才涌起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以至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大解放。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强大到担任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长大起来，能够在政治上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了。这二十三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恰恰记载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统治集团由叛变大革命篡夺国家统治权到最后崩溃，同时记载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经过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中小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复斗争，以至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即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所领导的力量斗争。同时也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所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① 蒋介石集团对内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依靠国际帝国主义，所以它的斗争如果成功，中国必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中国。中国人民革命，交叉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是经常进行着的；但是，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阶级矛盾就呈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以至形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曾经先后两次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组织在内，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叛变了革命。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是官僚资本企业，主持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版第一〇四八页。

子。报纸既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必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一时期的这个报，立场明确，始终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于中国革命走着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也就如影随形地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种曲折复杂的形态。而总的方向是：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人民，旧大公报拥护蒋介石，直到蒋政权的灭亡。

这大致可以画成如下的一幅曲线图：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新记公司大公报续刊之初，正当北伐军逼近武汉，大革命达到高潮，这个报就反映出资产阶级对于大革命的恐惧。它怕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怕工农学生的群众运动的兴起，一句话是怕“赤化”。它要蒋介石表明究竟是“赤化”还是“非赤化”的政策态度。顶到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了，大公报不怕了，吴鼎昌这个大官僚大银行家就千方百计地向蒋介石统治集团里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抵抗失掉东北三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根源于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全国人民愤怒地要求蒋介石抗日，蒋介石利用大公报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辩护，又把吴鼎昌拉进他的所谓“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为“准备抗战”的点缀，实际却在全力进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内战。以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转机，蒋介石被迫承诺了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只是抱着热烈拥蒋统一的心情，并未认真领会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团结、进步的精神。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以至八一三淞沪抗战起来，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大公报才打出“拥护抗战”的旗帜。蒋介石的抗战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张季鸾就部分地参加了这种活动。在八年抗战中，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进行了一些“小骂”，对于蒋

介石“统一军令政令”的叫嚣和几次反共阴谋进行了“大帮忙”。因为大公报对蒋政府“帮忙”有功，在抗日战争将近胜利的时候，胡政之向蒋介石敲了二十万美元官价外汇的竹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际和国内的阶级关系都起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表面上摆出一种和平姿态，实际上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时候，胡政之以所谓“社会贤达”^①的身份参加了旧政协和所谓“第三方面”，周旋于国共之间；大公报也维持着“第三方面”的姿态。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正式揭开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幕，是蒋介石的再一次叛变。胡政之到南京签名报到参加了伪国大，“第三方面”破产了；大公报的领导层在这时已经看出蒋介石的失败的命运，而由于它的阶级的规律，大公报也就撕掉了所谓“独立”、“自由”、“第三者”等等的纱幕，走着崇美随蒋的末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天天地胜利，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天天地失败，美帝国主义也知道蒋介石的大势已去，难于挽救了；但为了最后保留它的中国半殖民地，还寄幻想于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这时候，所谓“第三条道路”喧腾起来，一些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或多或少带有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他们没落阶级的挣扎中仰望着美帝国主义的“青睐”。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重视大公报，因而也把胡政之作为网罗的对象。胡政之的看法比美帝国主义真切些，他判断蒋政权终将灭亡，所以他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在此以前，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一个《大公报纽约双周》^②。这是他为他自己和大公报准备的退路，准备在中国解放之后流亡海外以至到美国去办“白华”大公报。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报馆的老板胡政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即上海解放

① “社会贤达”这个名词，是由政学系头子张群创造出来的，是指参加旧政协的无党派人士，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等都被称为“社会贤达”。

② 这个《大公报纽约双周》的内容，是把每两周内的大公报的重要社评译成英文发表，由于时局变化，发行不久即停刊。

前一个月死去了，大公报即在上海解放之后结束了它为中国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历史，归人民所有，获得了光荣的新生。

吴 胡 张 三 人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同出身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同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们三人少年时在日本同学，后来共同经营新记公司大公报。旧大公报前后共有四十七年的历史，吴胡张经营的一段约二十三年，约占旧大公报历史的一半，而其重要性却远远超过前段。这是因为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段历史时期重要了，也因为旧大公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所代表的阶级性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这个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发生了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的资本很单纯，主要是吴鼎昌的五万元，这是官僚资本。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这是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的三要素。这里先谈吴胡张三人的略史。

吴 鼎 昌

吴鼎昌，字达铨，笔名前溪，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华阳。吴原籍浙江吴兴。吴家世代当“师爷”，他的父亲吴赞廷在四川绥定府署作幕十七年之久，退休后即定居成都做寓公，在成都置有田宅。吴鼎昌出身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少年进学为华阳县秀才，入成都客籍学堂读书，获得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先在日本东京预备学堂修业，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吴工于心计，矢志作官。在日本留学时，正当辛亥前革命高潮时期，他挂名为同盟会员，并不革命，一般同学在课余时间从事政治活动或娱乐，他却闭门练写小楷，准备回国考洋翰林。回国应廷试，果然得中翰林院检讨。经其族伯山西藩台吴匡涛举荐给东三省总督锡良，先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后派充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后来又以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景葵的关系，被任为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转任大清银行

江西省分行监督。辛亥革命时，吴逃出江西，适成立大清银行清理处，吴参与了接收上海大清银行的事务，又参与了中国银行的筹备事务。吴先与研究系拉上关系，一九一三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任吴为造币厂监督。吴又与梁士诒拉上关系，梁为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将吴引荐袁世凯，袁未予重用，只给一个参议的空名。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搞洪宪帝制，任吴为农商次长，未就任。一九一七年张勋搞复辟运动，河南督军张镇芳附逆，复辟事平，张镇芳连带垮台。盐业银行系张镇芳所创办，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与张镇芳有联系，张在政治上垮了台，恐影响他的银行，请吴出来顶名担当盐业银行的事务。吴这时已与安福系发生关系，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遂令吴鼎昌接收盐业银行。他从此担任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一九一八年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约吴任财政次长，吴允为次长，但要求兼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吴两度任造币厂厂长，共七八年之久。因造币厂向日本购铜，得回佣；铸造银元的成色检验标准有伸缩，譬如国际标准为百分之八十八，得有千分之三的上下，北洋政府的标准为百分之九十，但含银至百分之八十的银元就敲得响了，吴因此发了财。吴在财政次长任内，适逢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总长，部务俱由吴鼎昌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①。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吴为北方分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吴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愿和，吴为代表，参与谋议，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议无成。一九二二年，吴鼎昌发起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创办“四行储蓄会”，并设“四行准备库”，为中南银行取得钞票发行权。四行储蓄会的领导机构由四人组成，即盐业代表吴鼎昌、金城代表周作民、中南代表胡笔江、大陆代表谈丹崖，推吴为主任，就此形成所谓“北四行”的集团。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投资五万元，与胡政

^① 据章士钊委员对作者说，这件事是吴鼎昌亲自告诉他的。

之、张季鸾接办天津大公报，吴为社长。

在此以前，吴鼎昌曾经对人说，他准备办三件事：（一）开一个报馆。他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计划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这两个人的三年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一九二六年他接办大公报，就是一次拿出五万元，以胡政之为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相约专心办报，不兼他职。新记公司大公报就这样办了二十多年，直到中国解放。（二）办一个储蓄会，以抵制外国人办的储蓄会。这就是四行储蓄会。这件事是成功的，四行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一亿元。外国人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被四行储蓄会挤垮了。（三）设一个国际大旅社，免得外国人来到中国都住洋饭店。这就是四行投资的上海国际饭店。这三件事他都做了，特别是大公报使他得到钻进蒋介石集团的一份政治资本。

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一生做官，一直到死。他从束着小辫子读书的时候就想做官，得秀才，留学日本，考洋翰林，走他族伯的门径开始做官；他通过叶景葵的门径钻进大清银行；拉上研究系的关系，因此抓到造币厂这个肥缺，尝到“升官发财”的滋味。他是个条陈专家，由清末到民初，他不断地给大官上条陈，以兜售他的心计，博得梁士诒的赏识。梁士诒把他引见袁世凯，袁世凯相他“背后见腮”，不予重用，只给了个参议。吴自己曾说他吃了相貌的亏。其实，袁世凯当时嫌他曾经挂名为同盟会员，经过考察，其人并不革命，所以到洪宪帝制时袁世凯对人说：“现在可以用他了。”给吴鼎昌一个农商次长，吴一嫌这个官不大，也看到袁皇帝的风头不顺，未曾下水。接下来，他从研究系钻进了安福系，由此抓到了盐业银行，成为银行界的重要人物；由此做了财政次长再兼造币厂长，真正发了财。吴鼎昌的钻进安福系，也还靠了他的赌博本领。他同安福系一些头子倪嗣冲、吴光新等一起打牌，混得很亲

热。吴能计算，善于赌博，很赢了一些钱，他在北戴河的一所别墅就是打牌赢来的。到一九二六年，在他投资接办大公报的前夕，安福系倒了，整个的北洋军阀也就要土崩瓦解了。在这时候，这个热心做官的吴鼎昌什么官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盐业银行总经理作他的基础。这时候，南方的新兴势力起来了，划时代的大革命开始了，北伐也就要出师了。吴鼎昌是善观气象的，他观察到他所立足的北洋军阀集团的气数尽了，必须面向南方，另靠新主。这时他的留日同学胡政之正在搞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这两个新闻出版企业都不得劲，经济困难，吴鼎昌每月津贴国闻周报三四百元，以资维持。吴鼎昌经常以“前溪”的笔名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借以买得一个“经济专家”的名气。当然，那时每周只发行几千份的国闻周报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时适逢张季鸾失业在天津闲居，吴鼎昌在天津当他的盐业银行总经理，胡政之在王郅隆的旧大公报关门后，在北京办国闻通信社，也常来天津走走。这三个当年的留日同学，又在日本租界相会，看着双门紧闭的大公报馆，就动了接办大公报的念头。张季鸾正无事可干，技痒难熬；胡政之的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都病恹恹地没有起色，对在自己手上办垮了的旧大公报也不甘心；吴鼎昌原有拿五万块钱办报的计划，这时正在无官寡居，大为寂寞，也愿意借胡张两个熟手办起一张报来，作为自己再挤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资本，于是一谈就“三人同心”了。吴鼎昌拿出五万元，由胡政之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的手上盘购了旧大公报馆，以胡政之的班底（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以及旧大公报的职工），加上张季鸾的一支笔，组成了新记公司大公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续刊。

新记公司旧大公报续刊之日，正值北伐军与吴佩孚军大战于汀泗桥，武汉摇摇欲坠。吴鼎昌这个拥有资财的投机政客，身在将倾的北方旧巢，面向陌生的汹涌而起的南方新兴势力，心旌悬悬，不知如何对待。他采取了积极态度，因为有大公报这个武器在手，他就活跃地利用起来。新记公司旧大公报九月一日续刊，九月二日

的报上就发表吴鼎昌写的署名“前溪”的题为《战卜》的论评。这篇文章是吴鼎昌的问路石,对南北两方且不作左右袒,只表示像似厌战的意思。随后看出革命营垒里有裂缝可寻,更由于他自己的阶级性的指使,他就接连着写《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暴发》等篇社评,向读者指点北伐军有“赤俄为之扶持,有青年为之宣传,国际势力之竞争”等等,从而挑拨“赤化”与“反赤化”之国际关系。等到看定了形势,蒋介石确有叛变革命的迹象了,他就在九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三十六期国闻周报上发表署名“前溪”的社论,题目是《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俨然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蒋介石表明他的政策是“赤化”还是“非赤化”。也就是要蒋介石表明他是忠实于与工农群众结成统一战线的大革命呢,还是像旧军阀一样继续做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和乡村豪绅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蒋介石果然叛变了大革命,大举屠杀工农人民,成为效忠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新军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叛徒蒋介石所篡夺,建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吴鼎昌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政客自然是霁然色喜,弹冠相庆,又“可以出而仕矣”。怎么钻进蒋介石的营垒,自然还要靠大公报这个武器。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中国新经济政策》一篇专文,并且印了单行本,分寄各方,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经济学者”,以搔首弄姿,插标卖身。顶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民族危机严重了,吴鼎昌搞政治活动的机会来了。他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内战”这个题目,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间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四团体,发起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这个大同盟的章程十条,就是吴所起草;发表通电,署名者都是上海的“闻人”,工商界巨头多在其中,吴鼎昌也在其中。吴鼎昌策动发起这个“废止内战大同盟”,固然看准了人们愿望和平害怕战争的心理,而在他个人却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嘴里喊“废止内战”,眼睛却向蒋介石送秋波。他所起草的废止内战大同盟的十条章程,开宗明义便

说：“鉴于外患内忧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以期安内对外。”这个“安内对外”到蒋介石那里就变成“攘外必先安内”了。在这个大同盟成立以前，吴鼎昌于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维持会发表演讲说：“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其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出现于全国。”这显然是指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对蒋介石“剿共”的抵抗。六月九日吴又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废止内战大同盟”，并将讲稿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宣传这个运动是由他策动、发起、组织起来的，以显示他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重大压力，蒋介石一方面需要比较有力量的报纸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辩护，另一方面也需要搞些花样作为他准备抗日的点缀。为了前一种需要，蒋介石叫于右任给张季鸾打电报，要大公报主张“缓抗”，以应付全国各方面，特别是青年学生请愿抗日的怒潮，大公报的确为此大卖了力气。为了后一种需要，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之下组织了一个所谓“国防设计委员会”，网罗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参加，以为点缀。在金融界方面，钱昌照给蒋介石开了个三人名单：吴鼎昌、徐新六和张嘉璈。在此以前，张季鸾曾经在蒋介石面前揄扬过吴鼎昌，蒋此刻为了需要，自然加以延揽。这年夏天，蒋约吴在牯岭见面，连续谈了一星期，对吴大为赏识。从此，吴鼎昌跨进了蒋介石政权的门槛。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牢牢稳占了东北四省，并且已经显示它要向关内前进了，它要占领全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蒋介石为了继续欺骗人民，准备组织一个以他自己为行政院长的“名流内阁”，内定以吴鼎昌为实业部长。先于这年十月间，由吴鼎昌纠合平津沪汉金融工商界首脑人物，组织了一个“赴日经济考察团”到日本去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这个考察团一行共有三十四人，团长为吴鼎昌，团员有陈光甫、俞佐庭、周作民、黄文植、刘鸿生、徐新六、唐寿民、钱永铭、宋汉章、邹敏初、钟铨、胡筠庵、黄江泉、南经庸、祝士刚等。从这个团的组织成员来看，

吴鼎昌俨然已取得当时金融工商界领袖的地位。吴鼎昌从日本回国不久，即于这年十二月坐上南京政府实业部长的交椅。吴鼎昌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从此升堂入室了，这在吴鼎昌算是如愿以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汉，吴鼎昌即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当他在贵州期间，闲暇时在贵阳花溪饮酒赋诗，有的时候穿着上将的戎装向国民党军官和部队“训话”，是他做官很“写意”而过瘾的时候。一九四五年被调到重庆当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的幕僚，他小心翼翼地伺候蒋介石。这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对日抗战的历史阶段过去了，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蒋介石，紧紧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一面急着抢受降，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一面加紧准备内战，以遂他灭共统一的野心。蒋介石原是坐待胜利的。一旦胜利突然到来，使他一切措手不及。他需要时间。抢夺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准备反共内战更需要时间。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了，他要蒋介石装出一副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他预料毛主席不会到重庆去。如果毛主席不到重庆去，国民党可以借此宣传是共产党不愿意谈和平；如果毛主席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国共谈判的时间抢受降，调兵遣将，准备内战。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这个计策，即令吴起草了一个“寒电”，于八月十四日拍往延安。吴于十五日晨把电稿交给大公报，要在当天的《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个独占的大新闻。稿子发排后，被新闻检查所扣住了。该所请示“侍从室”，陈布雷说“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原来像这样的重要文电，向由陈布雷经手，而这次却由吴鼎昌献策并经手发出。结果这项新闻大公晚报未能抢先，而是由“中央社”统一发稿，十六日同见各报。毛主席于十六日答复了蒋介石的电报，朱德总司令同日也给蒋介石一个电报，向蒋介石政府提出六项严正要求^①。蒋介石又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两次电邀毛主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四二页。

席去重庆,美国驻重庆大使赫尔利还在八月二十七日为此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等到了重庆,可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①。这就因为蒋介石本来没有和平的诚意,只是由于吴鼎昌的献策,而且预料毛主席不会去,所以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电报邀请,对于和平谈判却毫无准备。一九四五年九月吴鼎昌一度兼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顶到蒋介石悍然揭开反人民的内战之幕,南京伪“国民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吴鼎昌被任为“总统府秘书长”。以吴鼎昌的“聪明”,他已经知道蒋家天下快完了,很想摆脱不干,而又不敢,深自慨叹业已“不能下船”了。那时他感到这样一种恐怖:他如果要坚决不干,蒋就会把他的身家性命干掉。他在这年年底在大公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新记公司的董事,是他的善后布置之一。顶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结束了,蒋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被歼灭了,蒋介石的伪总统干不下去而宣告“引退”了,李宗仁代理总统了,吴鼎昌才乘机辞掉这个“总统府秘书长”的官衔,背着人民判决的第十七名头等战争罪犯的罪名,溜到香港做寓公。吴鼎昌一生热中于做官生活,机谋策画,惯作幕后勾当,用尽聪明手段,以求名利双收,到头来却以战争罪犯结束了他一生的做官生涯。吴鼎昌在溜到香港以前,就把他的“动产”变为黄金美钞逃汇国外,预备做个白华阔佬。可是他的生命将尽了,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病死于香港,年六十六岁。

胡 政 之

胡霖,字政之,笔名冷观,一八八九年生于四川成都。他的父亲

^①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五八页。

胡登崧，是甲午科（一八九四年）举人，捐官知县，在安徽省做官，先代理天长县知县，一九〇六年死于五河县知县任内，在成都留有祖遗田地。胡政之在八岁时随父到安徽读书，先入私塾，后入安庆安徽省高等学堂。十七岁丧父，自费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日本大学学法律，一九一一年回国。一九一二年先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日文翻译，又参加了于右任、张季鸾等在上海创设的民立图书公司；同时在上海与友人合组一个“衡平律师团”，执行律师业务；旋至清江浦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任刑庭庭长，时间俱不久。一九一三年胡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兼任中国公学法律教员。一九一五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胡为秘书长；一九一六年王调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胡又任内务部参事。胡政之由此同安福系发生了关系。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英敛之把他所经营的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王郅隆接办时，以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这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胡政之进大公报也由于安福系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安福系首领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宣传得有声有色。据胡政之自己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涨，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①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结束，胡政之得到王揖唐的资助，代表大公报采访了一九一九年举行的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中唯一的中国记者。巴黎和会后，他继续留欧，游历了英、德、意大利、瑞士等国，于一九二〇年回国。这时正当直皖之战爆发，安福系失败了，大公报也萎靡不振，他离开大公报，到林白水主持的北京《新社会报》任总编辑。后因与林白水意见不合，离开新社会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上海开办国闻通讯社。这个通讯社是以“民间新闻事业”的面目出现的，实际隐藏着政治背景。这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亲日卖国的安福系军阀倒台了，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正在台上，军阀的地盘

^① 见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时写的《回首一十七年》，载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公报上海版。

之争十分火炽。失意的安福系图谋复起，他们一面在北方策动直奉冲突，一面在南方也进行反直活动。安福系在南方的活动，以本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为中心，联络广东的国民党和黔桂的政学会分子，成立了一个临时结合。这个临时结合的活动中心设在上海，各方面的联系人，广东方面是杨庶堪，黔桂方面是邓鸣阶，浙江方面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和关建藩。这个反直系的结合，为了进行政治斗争，需要一个宣传机构，遂决定组织一个通信社。派谁来办这个通信社？这个政治结合是以安福系为主体的，就必然由安福系的人或接近安福系的人来办这个通信社。胡政之和安福系有关系，担任过安福系机关报（一个时期的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采访过巴黎和会，他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由于主要的出钱的人是卢永祥，所以胡政之只能主持编辑采访方面的工作，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则由卢永祥的亲信石小川指挥（石是个军人）。一九二二年四月成立国闻通信社汉口分社，同年十一月成立国闻通信社北京分社。按照胡政之的意思，他是要把国闻通信社搞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通信社的。但这个意图未曾办到，原因有二：（一）一般报馆不肯也不能出较多的稿费；（二）国闻通信社的政治后台也不肯多给钱。国闻通信社先在沪社搞了一个广告部，给各报兜揽广告得些回佣。胡政之感到通信社只能给各报供给稿件，不能发表言论，乃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国闻周报，作为国闻通信社的附属事业。这年九月江浙齐（燮元）卢（永祥）之战起，结果卢永祥失败，国闻通信社的后台垮了，经济更困难了；树倒猢猻散，与卢永祥有关的人员都自动地离开了国闻通信社，胡政之就完全掌握了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经济困难怎么办？胡政之一面要职工勒紧裤带苦干，一面找到吴鼎昌，由吴每月接济三四百元，以资维持。吴鼎昌对国闻周报有兴趣，经常用“前溪”的笔名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以猎取一个经济学者、言论家的资格。胡政之和吴鼎昌合作由此开始。一九二六年夏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相逢于天津，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社，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

编辑兼副经理，于九月一日续刊。北京、上海、汉口三处国闻通讯社成了大公报的采访机构，国闻周报移津出版，成了大公报的附属刊物。国闻周报由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沦陷后停刊，共出版了十三年余之久，发行数字曾达一万五千余份，颇有影响。

胡政之出身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留学日本，学法律，归国后，当过短期的法官，在安福系的圈子内混了一阵子，他看清了做官的生活没有前途，决心搞新闻事业。他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为时不久。他正式办报，应该从担任王郅隆时期的安福系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算起。他从欧洲回国后，一度同林白水合作，未搞好。从那时起他就有心自己办个新闻事业。结果还是由于安福系的关系，拿卢永祥的钱开办了国闻通信社及以后的国闻周报，都不算成功。直到一九二六年结合了吴鼎昌的资本和张季鸾的笔，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才得到发展。新记公司大公报的机构，胡政之是主要的组织者。编辑采访人员主要是国闻通信社的干部，经理部人员由前大公报和国闻通信社的干部拼合起来的，工厂主要是前大公报的工人，所以由胡政之任总经理，掌握用人行政之权，是很自然的。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逐年发展，机构也逐年扩大，的确表现了他的经营才能。他学法律，因此重视规章制度；他重金钱，因此相当工于算计；他擅权术，因此有一套操纵用人的方法；他不讲情面，同张季鸾的作风相反，他很少用金钱帮助过亲友，从不给人写一张荐牒。大公报职工背后皆称胡政之为“胡老板”。胡政之的确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华军于那年的十一月八日又搞了一个天津事变，逼得大公报无法再在日本租界出报，被迫停刊了六天，迁到法租界继续出版。以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

^① 说胡政之是“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因为还有个王云五更为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